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中国共产党 新时期简史

历史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改革走向深入与治理整顿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新世纪/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1(2011. 5 重印)
ISBN 978-7-5098-0089-8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1978—2008 IV. D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 第 150138 号

责任编辑: 黄 艳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 dscbs. com](http://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字 数: 188 千字

印 张: 12. 5

印 数: 229001 - 259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3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089-8

定 价: 30. 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 - 82517687

前 言

1978 年底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 21 世纪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向前进的。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

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的快速发展是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的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改革开放30年来，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在改革开放即将迎来3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是我们撰写这部《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的初衷。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内容和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在写作时主要依据党的文献和原始资料，力求准确反映这30年的历史进程，但由于水平所限，只能对这30年的历史作比较简要的回顾，书中难免有不准确或疏漏之处，我们热忱希望党史工作者和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组

2008年8月

目 录

前 言	/ 1
-----	-----

第一章 历史的伟大转折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 1
---------------------	-----

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历史转折的前奏	/ 1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	/ 5
三、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	/ 10
四、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冲击	/ 17
五、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	/ 28

第二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 33
-------------------------	------

一、党的十二大和实现小康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初步形成	/ 33
二、提出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	/ 37
三、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 40
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 49
五、外交、国防战略的调整与“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	/ 53
六、整顿党的组织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 59

第三章 改革走向深入与治理整顿的实施	/ 64
--------------------	------

一、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64
二、国民经济跃上新台阶与治理整顿的初步实施	/ 69
三、平息国内政治风波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 74

- 四、加强党的领导与密切党群联系 / 78
- 五、开展睦邻外交和打破西方“制裁” / 82
- 六、治理整顿的完成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 86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 95

-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的召开 / 95
- 二、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 101
- 三、成功实施宏观调控与制定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 104
- 四、努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111
- 五、继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116
- 六、香港、澳门回归与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 119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新世纪 / 125

- 一、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 125
- 二、继续深化改革与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129
- 三、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 136
- 四、推进军队、国防现代化和发展面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 / 143
-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 149

第六章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 157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与小康目标总体实现 / 157
- 二、党的十六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制定 / 162
-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167
- 四、继续推进军队国防建设、外交工作和祖国统一大业 / 174
- 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 178

六、党的十七大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 前进	/ 182
--------------------------------	-------

结 束 语	/ 187
-------	-------

后 记	/ 192
-----	-------

第一章 历史的伟大转折与 改革开放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艰辛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党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党和国家的面貌开始发生迅速而深刻的变化。

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历史转折的前奏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开辟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从此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中国人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繁重任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并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应当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课题。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党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过程中，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实行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领导体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上述体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显示了一定的优越性，但也暴露出过于集中统一、不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基层和个人积极性等缺陷。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和借鉴苏联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注意的十大关系，其中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外国经验一定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要从经济工作各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挥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从这时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长期探索。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党在探索过程中既取得了辉煌成就，又留下了深刻教训。一方面，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使党在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曲折，先后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历时十年的全局性错误。

从1956年到1976年，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没有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工作重点及时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一再急于求成，违背了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产生这些失误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特别是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清醒认识，没有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

力状况的要求，对经济管理体制和领导制度中的某些不适应方面及时进行改革，结果使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愈加僵化。“左”的指导思想和僵化的体制使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些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组成的“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灾难。这就为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重新回到正确轨道，开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立即部署和开展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着手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进行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使领导拨乱反正的力量得到极大加强。8月，党召开的十一大明确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

在邓小平推动下，拨乱反正首先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取得突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重申，“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大批科研机构陆续重建，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工作开始恢复，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1977年秋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得到恢复。高等院校的招生重新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当年便有570多万名青年报名参加高考，29.3万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人）被各高等院校录取。这一重大措施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拥护，不仅使更多的青年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开始形成。

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种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僵化现象又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关，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的方针政策。1977年2月“两个凡是”指导方针提出，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两个凡是”方针的

推行使拨乱反正步伐受到严重阻碍，“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受到肯定，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广大干部和群众纷纷要求改变这一局面，并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带动和引导下开始向“两个凡是”禁区发起冲击。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同陈云、叶剑英等一批老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党的实事求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1978年5月，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文章的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因而立即引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观点，号召全党解放思想，打破僵化，使这场讨论迅速发展成得到党内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党内一些同志实事求是地对历史进行反思，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经济理论界突破了把按劳分配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禁区，对按劳分配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明确肯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混乱。1978年5月，国务院作出决定，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止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这一时期我国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党内许多同志在重新观察世界发展趋势，正视我国经济发展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主张。1978年下半年，国务院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提出了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改革经济体制等建议，并要求经济工作实行相应的转变。其中，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了如何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以加快我国建设速度的问题。

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时再次呼吁，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现在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

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还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真理标准讨论促成的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和邓小平关于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为党重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现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准备了充分条件。一个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即将到来。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左”倾错误的思想禁区，引发了党内外解放思想的潮流。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下，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对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打开了拨乱反正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加，全党对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并由此产生了加快我国现代化步伐的迫切愿望。此时，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一场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大量新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生产。另一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经济滞胀局面，急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为过剩的资本和生产设备寻找出路。这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此，党内许多同志强烈呼吁，抓住这种机遇，积极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借鉴国外经验，改革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邓小平明确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① 这一主张，不仅代表了党内的共识，而且也体现到党和国家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133页。

的方针政策上。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1978年下半年，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明显加快，先后签订了22个成套引进项目的合同。虽然引进工作受到当时经济领域急于求成倾向的影响，出现了规模过大、要求过急的问题，但毕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高的起点，同时也为党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作了积极的准备。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准备。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必然要求首先解决影响党和国家安定团结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为此，一些同志从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的要求。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①。随后，他提出了六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陈云等一批老同志的带动下，与会同志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纷纷发表意见，出现了此前少有的党内民主气氛。

对大家比较集中地提出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认真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

^①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的几项决定。这些决定得到与会同志热烈拥护，会议气氛也因此更加活跃。

会议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出现的认识分歧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讨论，大家普遍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思想路线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应当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发扬民主和解放思想的气氛下，与会同志结合对建国以来历史的反思，还对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时，不少同志提出，为了确保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应该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重新认识。在讨论两个农业文件时，许多同志指出：现在全国有近两亿人每年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全国人均粮食比1957年还要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左”倾错误。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时，很多同志都赞成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吸收国外资金，以加快建设速度的主张。在讨论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不少同志对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提出了批评，希望不要重犯1958年一哄而起的错误。大家还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等一系列建议。

12月13日，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针对当时全党面临的突出问题，他着重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解放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解决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分清一些人的功过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143页。

是非，纠正一批重大冤案、错案、假案，“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①。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方面的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②。这篇讲话回答了在历史转折关头党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因而受到与会同志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终于摆脱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审议通过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中央工作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全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郑重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认真酝酿，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虽然华国锋这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

决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而言，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会议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全会作出的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党和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历史转折。由于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内外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政策表现出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些思想倾向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如果听任这两方面倾向的发展，必将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

针对上述现象，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

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三、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从1979年到1982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了全面而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通过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妥善调整了社会关系。通过调整国民经济长期存在的比例失调现象，端正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通过起草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认真清理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首先在思想理论上，重新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作出正确判断，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1979年1月至4月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明确否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新的方针。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已经证明这个提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无论缩小或者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对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① 这些新的阐述，澄清了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是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理论工作务虚会后，各地还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使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化，推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